

赵曦著

# 中国西部农村 反贫困模式研究



中华女子学院



0352653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

赵曦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赵曦著. —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6726-3

I. 中… II. 赵… III. ①农村-贫困-研究-西北地区  
②农村-贫困-研究-西南地区 IV. F323.8 F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341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

赵曦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726-3

---

2009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3 1/4

定价:45.00元

# 目 录

导 言	1
第 1 章 世界反贫困战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模式	11
1.1 世界反贫困战略的理论检索	11
1.2 世界反贫困战略的实践模式	40
1.3 反贫困战略模式的比较研究	71
第 2 章 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历史背景与基本模式	91
2.1 反贫困的国际背景与历史进程	91
2.2 反贫困的历史进程与基本模式	95
2.3 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国际评价	130
第 3 章 中国农村反贫困的严峻态势与分布特点	135
3.1 农村反贫困的现实背景	135
3.2 农村反贫困的严峻态势	139
3.3 农村贫困地区的分布特点	146
第 4 章 西部农村反贫困的难点问题与制约因素	156
4.1 农村反贫困的基本困难	156
4.2 农村反贫困的主要问题	164
4.3 农村反贫困的最大障碍	168
4.4 农村反贫困的突出难点	174
4.5 农村反贫困的制约因素	183
第 5 章 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	189
5.1 制度变迁与反贫困治理	189

5.2	农村反贫困的制度障碍 .....	196
5.3	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创新 .....	204
第6章	西部农村反贫困的资金管理与运行模式 .....	215
6.1	反贫困资金投入类型与管理绩效 .....	215
6.2	反贫困资金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 .....	227
6.3	反贫困资金管理体制的调整改革 .....	236
6.4	新型反贫困资金管理的运行模式 .....	242
第7章	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功能定位与反贫困模式转型 .....	250
7.1	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功能定位 .....	250
7.2	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的指导思想 .....	264
7.3	新时期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转型 .....	275
第8章	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总体战略模式 .....	284
8.1	确立反贫困战略模式的基本理念 .....	284
8.2	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的主要内容 .....	291
8.3	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的实施重点 .....	301
第9章	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实践模式 .....	308
9.1	社会服务模式 .....	308
9.2	教育培训模式 .....	318
9.3	产业发展模式 .....	327
9.4	小额信贷模式 .....	336
9.5	移民搬迁模式 .....	350
参考文献	.....	366
后 记	.....	370

# 导 言

冷静分析与判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态势,探索有效缓解和消除贫困的基本途径,确立新型农村反贫困治理模式,是 21 世纪初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和必须解决的重大人类课题。西部农村贫困的缓解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西部区域的资源开发与转换进程、农牧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以及西部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和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消除人类贫困既是西部大开发重中之重的战略任务,也是难中之难的长期任务。系统梳理反贫困战略理论,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模式,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科学审视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严峻态势,重新确立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功能定位,对于进一步推进反贫困战略理论研究的深化,全面认识西部农村反贫困制约因素,推动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区域协调发展,努力探索建立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区域模式,扶贫制度创新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在对中国西部地区众多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发展状况进行重点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分析西部农村贫困地区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贫困人口分布特点,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障碍,运用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着重围绕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的指导思想、开发方针、模式转型、战略内涵和实施途径进行

综合性的分析和阐释。本书研究的重点是进一步推进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的制度安排、资金管理、人力投资、产业发展、小额信贷、移民搬迁等实施途径。本书研究的目标是力图探索建立适应西部农村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参与式的、可推广的反贫困模式,为全面实施新的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可操作的政策调整思路。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不仅提出了内涵不同的反贫困理论,刘易斯(Arthur Lewis)、纳克斯(Ragnar Narkse)、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佩鲁(Francois Perroux)、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罗斯托(Walt Rostow)、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人还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反贫困模型,这些理论或模型主要都是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的,或强调资本积累与投资的功能,或强调人力资本投资,或强调传统农业改造,或认为应将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领域。只有少数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困难与客观障碍,考虑了反贫困进程中的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口参与的重要性,也只有少数的模型研究了劳动力与人口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如刘易斯、纳克斯、哈罗德(R. F. Harrod)一多马(E. D. Domar)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积累上,赫希曼认为应采取非平衡增长方式解决贫困问题,舒尔茨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和传统农业改造,缪尔达尔则指出贫穷国家的发展应更多地改革政治制度和控制人口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究竟实施何种扶贫战略模式一直是反贫困战略研究的难题,有效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两方面兼顾的战略是世界银行着力推荐的减贫战略。国际研究普遍表明,在极端不均衡的社会结构中,单纯的经济增长对减轻贫困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使大多数国家实现减贫的目标,赋予发展权力、创造经济机会、提供安全保障才是反贫困战略的核心。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逊(Jams Wolfinsen)在《2005世界

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制度和治理是可持续增长和减轻贫困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理论研究方面，卡恩、贾兰和拉维林(Khan, Jalan and Ravallion)进一步研究了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关系，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也会使减贫速度降低。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研究了贫困与制度、技术与文化的内在联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讨论了与贫困密切相关的能力不足、能力剥夺和社会排斥问题。这些学者的研究大大提升了贫困问题研究的理论层次，拓展了反贫困战略的政策框架和运用范围。在实践上，世界反贫困实践主要形成了以印度为代表的满足基本需要模式、以巴西为代表的发展极模式、以韩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综合反贫困模式、以孟加拉国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以及以英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障模式。这些模式侧重不同、效果各异、影响广泛，对于深入研究和探索建立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很多学者认为，在21世纪初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西部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等诸多挑战，但所面临的最突出、最大的挑战则是人类贫困，应把缓解人类贫困放在西部发展最优先地位，并调整西部地区的反贫困战略，由过去单纯关注收入贫困转向关注知识贫困、权利贫困和人力贫困”(胡鞍钢，2002)。由于西部贫困人口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极端贫困人口多生活在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或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域，目前以贫困村为单位的整村推进扶贫方式难以实现反贫困总体目标”(李德水，2004)。有的学者从制度安排的层面对中国扶贫体制进行了反思，认为政府的过度主导以及扶贫贷款分配机制的缺陷是反贫困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在反贫困的对象、开发模式、公众参与方面进行统筹考虑(林毅夫，2006)。学术界普遍认为，进一步推进西部农村反贫困必须在制度安排、政策体系、机构设置、部门协调等领域进行调整和改进，建立新型扶贫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扶贫机制和扶贫模式。

笔者长期研究认为，西部农村反贫困面临的最显著困难是生存环境



的严酷,最尖锐的问题是扶贫体制的缺陷,最基本的约束是扶贫投入的不足,最突出的障碍是贫困人口人力素质的低下。世界上任何成功扶贫模式在西部农村的简单移植都难以取得直接而有效的结果,必须重新考虑西部贫困地区的功能定位,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具有更强针对性的反贫困模式及配套制度政策。从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实践考察,由于纵向行政体制的约束和政绩考核标准的错位,普遍忽视扶贫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普遍忽视社会服务和人力投资是西部农村反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西部农村反贫困过程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治理结构,也是农村反贫困质量较差和脱贫人口返贫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因此,扶贫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是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建立的基本前提,必须探索新型的扶贫制度将扶贫从政府、部门和社会这种纵向的、行政性的扶贫方式转变为由政府、部门、社会和贫困地区政府及广大贫困人口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反贫困行为模式。

西部贫困地区是中国自然条件最恶劣、少数民族人口最集中、贫困发生最广泛的地区,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独特的区域性个性,表现为高原山区的特点、少数民族的特点、边远地带的特点。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综合现象,是历史长期的积累。西部贫困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不仅在收入水平、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生产效率、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距,而且在包括人的素质、思想观念、教育文化、人类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进化过程中存在着历史阶段性的差距。要缩小或消除这些差距,必须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更特殊的扶持政策、更具体的综合投入和更艰苦的工作努力。因此,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背景下,西部贫困地区反贫困必须突破传统的、单纯的经济扶贫模式,使反贫困战略更多地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和科学发展等多方面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观点。西部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扶贫对象所体现的民族性、区域性、边缘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特征。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意义,即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保证每

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分享资源配置利益和完善个人价值。充分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到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缓解和逐步消除贫困、改变不发达状况、培育发展要素、健全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任务,更不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西部贫困地区的反贫困必须从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在选择产业结构、确定主导产业、资源开发的层次、速度与范围等方面,都要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情况与条件,合理安排地区开发的重点、规模与节奏。在反贫困实践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方针,既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制定切合实际的扶贫项目资金分配、实施程序和检测评估标准;尽力把扶贫资源最大限度地用在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种植业、养殖业及其他特色产业上,用在与解决贫困人口生存、生产、发展问题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同时,致力打破西部贫困地区封闭循环的发展模式,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范围和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引进资金、技术和适用技术人才,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和国内非政府组织支持,逐步建立开放性的区域社会经济结构,尽快实现西部贫困地区传统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缺乏对贫困地区科学准确的功能定位使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在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必须从战略的、全局的高度把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确立为中国重要的生态保障区、中国原生态文化的发源区、中国革命的贡献区及感恩区、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区和国防安全的前沿阵地。推进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必须根据西部贫困地区的功能定位,依托落实以人为本、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公正、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依托扶贫制度变迁和扶贫制度创新实现传统反贫困战略的转型,即在扶贫模式上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在推进机制上由政策扶贫向制度扶贫转型,在传递方式上由纵向扶贫向横向扶贫转型,在扶贫范围上由局部

扶贫向整体扶贫转型,在扶贫目标上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型,从而在明确西部贫困地区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为构建新型的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框架、进而为确立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重点创造条件。

虽然西部农村的贫困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导致贫困人口致贫的主要因素却迥然有异。因此,农村反贫困的基本目标绝不能是简单的组合,而必须体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复合性,扶贫方式也理应改变单一的、分散的、以经济扶贫为主体的传统模式而实施全面的、集中的、综合性的扶贫模式,以满足不同贫困人口的不同需求,最终形成以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存能力、基本生产能力和基本发展能力为核心的新型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表明,西部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模式就是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在西部独特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实施的、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反贫困的基本范式,其主要内容是在进一步加强物质救济、对口帮扶和区域发展援助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全新的扶贫管理体制和资金运作模式,通过政府主导的一系列扶贫计划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政策的综合投入,以建立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目标,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技扶贫、深化对口帮扶、加强乡村政权组织建设,全面改善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和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有序推动西部贫困地区生态资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开发和劳务输出的发展,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的建立必须同贫困地区特色资源开发、基础设施改善、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工程建设结合起来,与移民搬迁和农村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同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结合起来,同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共同进步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在西部贫困地区反贫困总体战略模式的指导下形成富有区域特色的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模式、教育培训模式、产业扶贫模式、小额信贷模式和扶贫搬迁模式。

西部农村反贫困总体战略模式的基础是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能力。即在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判定贫困地区贫困形成的原因、贫困的运行

机制和贫困人口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选择出最需要得到扶持的绝对贫困人口作为反贫困战略的实施对象,重点向以人类贫困和弱势群体贫困为主体的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包括通过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和国际机构向他们提供粮食、衣物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人畜饮水、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基本住房以迅速缓解贫困状况。其中,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呆、傻等丧失基本劳动能力、很难通过扶持手段脱贫的特困人口要建立贫困农(牧)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人均纯收入在1 067元以下的贫困户,特别是无房、无畜、无耕地(草场)的“三无户”以及贫困妇女单亲家庭户,要采取长期救济方式扶贫;对于缺乏基本生存条件,或基本生存条件严重丧失、地质灾害频发区、地方病流行区的贫困人口要以救命基于扶贫的指导方针克服一切困难采取坚决措施移民搬迁。

西部农村反贫困总体战略模式的重点是培育贫困人口的基本生产能力。即向以收入贫困和知识贫困为主体的相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产条件,包括通过政府扶持、社会援助、以工代赈、个体参与的方式向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帮助其修建基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及基础能源、通信设施,以全面改善农(牧)业基本生产条件,使贫困人口通过种养业及与此相关的家庭手工业或农村日常服务业取得收入,为贫困人口增收致富奠定基础。满足基本生产能力要求始终把改善和发展贫困地区基本生产能力作为反贫困的基础环节,中央政府及贫困地区政府要大幅度增加对贫困地区基本农田、围栏草场建设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建立由国家、地方和贫困农户组成的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新型融资机制。发动群众治山、改水、兴林、修路、建园、办电、改良土壤、完善灌排系统等,建立以基本农田为基础的农林牧综合发展的贫困地区经济结构。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调整农牧业内部结构,把发展旅游业等特色产业放在重要位置,依靠科技进步促使农业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农(牧)业资源的配置效率。

西部农村反贫困总体战略模式的目标是提升贫困人口的基本发展能力。即向以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为主体的全体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发展能

力,主要内容是通过健全的基础教育、规范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各种层次、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广泛技术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的农业生产技能、非农产业技能、劳务转移技能以及择业技能,提高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我生存能力、自我选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满足基本发展能力特别强调贫困人口直接参与农牧区的社会服务计划,如基本农田建设、乡村道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教育培训设施建设、卫生设施建设等,提高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力更生的程度,并辅之一系列区域性发展援助政策措施,如增加财政投入、加强信贷支持、推广以工代赈、发展特色产业等,提高贫困人口把握经济机会的能力,保证贫困人口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实现收入增加,不断推动贫困人口进入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循环,激发贫困人口产生新的需求和追求,从而逐步形成一种能够使贫困人口发展自身潜能的发展模式。

从1978~2008年30年间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实践考察,贫困地区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摆脱贫困的经济机会或缺乏把握经济机会的能力,大多数贫困人口缺乏多样化的谋生技能,只能从事简单劳动且劳动效率极低,并严重受制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因素。大部分贫困人口既缺乏健康的体魄,无法胜任持久、紧张的劳动,更由于文化素质的极端低下而无法进行产业发展方式的选择。贫困人口在体力、智力上的缺陷使他们在经济机会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从而加剧了贫困的发生。同时,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复杂特殊,贫困地区的反贫困面临着一系列客观存在的且较难克服的问题、困难和障碍,由此成为中国西部农村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应科学确立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的指导思想、开发原则和基本目标,采取以制定法律制度、建设传递机制、完善政策体系、强化资金管理、建立参与机制以及加强监督约束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措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是一个综合性的、以满足贫困人口基本需要为主体的战略模式,其实施内容是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扶贫计划来完成的。在反贫困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如果说社

会服务计划、产业发展计划和小额信贷计划的实施重点是向贫困人口直接提供经济机会的话,那么教育发展计划、科技培训计划和移民搬迁计划的实施重点则是向贫困人口提供把握经济机会的能力。反贫困计划实施的目的是通过对贫困人口的素质提高和环境建设,把反贫困由传统的纵向传递行为转变为贫困人口自觉参与的社会行为,把贫困人口从接受援助的被动脱贫者转变为自觉参与脱贫、自觉寻找脱贫机会的主动脱贫者。同时,通过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使贫困人口重视其生存质量的改善,尽可能地保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在受到外界较大干扰时,能够恢复和维持自身的生产能力,并能够认识在实施反贫困战略及各种相关的脱贫活动中不能危及贫困地区的内在发展能力,其自身的脱贫与发展应尽可能地减少对人类生存基础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维持一个基本不变或有所增加的资源储量,并逐步把贫困地区资源开发的重点放在社会资源的开发上,而不是以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如果在满足基本需要战略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社会服务计划、教育发展计划、科技培训计划、小额信贷计划和移民搬迁计划的配套协作,努力做到反贫困战略的客观性、针对性和完整性,努力做到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与特色产业发展的相互协调,努力做到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的极大改善,将探索出一种在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中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两种投资战略的有效结合方式和实践途径,从而走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究竟实施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还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的反贫困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真正把摆脱贫困、寻求发展纳入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资源综合开发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确保到 2020 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战略目标,业已昭示天下。回顾过去,我们依靠全面性改革、全方位开放和跨越式进步,从沉重暗淡的贫困浓雾中走出,实现了从动荡到安定、从封闭到开放、从贫穷到小康的历史飞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面对现实,我们正视贫困给社会稳定、民族团

结、国家安危带来的严峻挑战,充分认识反贫困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始终坚持把推进扶贫开发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重点;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务必以科学严谨的发展理念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创新体制机制、转换扶贫战略、完善治理结构,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 第1章 世界反贫困战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模式

和平与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而迅速摆脱贫困、寻求发展、缩小差距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严峻挑战。阐释贫困发生的经济社会根源、提出反贫困战略的理论框架和运用模式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系统研究发展经济学反贫困战略的基本理论及实践路径,客观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反贫困斗争的主要经验,是研究选择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的基本前提。

## 1.1 世界反贫困战略的理论检索

人类对贫困的认识及与贫困进行斗争的历史,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一样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先哲就将“贫穷”和“贫困”释义为财物极为缺乏的艰难窘迫境况。春秋末年轻丘明在《左传·昭公十四年》中认为:“大体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贫者家少财货,穷谓全无家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贫困论述。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周在《庄子·让王》中将贫困简单界定为“无财谓之贫”。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况在《荀子·大略》中进一步说:“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为贫,至无有者为穷。”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贫定义为:“贫,财分少也。”三国时魏明帝太和年间博士张揖撰《广雅·释诂四》则把穷释义为:“穷,贫也。”北宋初年陈彭年等人在《大宋重修广韵》中也认为:“贫,乏也,少也。”在中国古人看来,“贫”与“穷”含义大体相同,都是指缺乏财物,但“贫”与“穷”有量或程度方面的差别,“穷”更胜于“贫”。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Adam Smith)对“贫”与“富”含义的阐述,也是从财物或财富多寡的角度来解释的,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指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在什么程度上享有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是贫困作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为人们所重视,且被纳入理论研究的领域,其历史并不长,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最早对贫困这个社会问题的研究是15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贫困问题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露资产阶级平等、自由和博爱的虚伪性,指出资本主义工厂是“温和的监狱”,雇佣劳动是奴隶制的复活,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多血症的危机”,贫困由富裕产生。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贫困视为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反理性原则的集中表现,他们从政治变革的立场出发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现象进行归纳和较为详细的描述,并从改造人类社会、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理想社会的角度对贫困与如何摆脱贫困进行了初步探索,尖锐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和祸害,认为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消灭私有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对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深刻的揭示,得出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结论并指出了消除贫困的制度安排,认为“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马克思、恩格斯,197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趋势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真正将贫困问题作为主题进行系统研究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其理论的核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消除贫困。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参与贫困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与观点,构成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研究的基础。